

行印社版出紀世

二之號九巷條三門華西京南

世紀評論

社論

不能再因循了！

專論

苦悶甚於饑餓

從「知難行易」學說的評判

說到國民黨今後的出路

論杜魯門主義

管衛與教養的消長

政治上的神經病

一個科學的文化理論(書評)

北京大學三十一教授對最近學潮的態度

賈鈺生

樊 宏

王遂今

吳景超

錢實甫

似 彭

時事

最近的和平醞釀

紀要

朝鮮美蘇聯合委員會重開

編輯後記



世紀出版社印行

南京西華門

三條巷九號之二

電話：二二八一五

張純明主編
世紀評論

第一卷 第二十二期

上海辦事處

北京路二五五號七樓

印刷者：

南京美吉印刷社



社論

不能再因循了！

三個月前，我們在本欄曾以『嚴重的關頭到了』標題，指出中國危險的局面，希望當局趕緊以大刀闊斧的方法，打出一條出路；否則，病入骨髓，雖有良藥，不能為力，雖有扁鵲，必將一望而逃走。我們不是危言聳聽，我們不是唯恐天下不亂，我們是中國的人民，所以我們不忍看見中國從此陷入五胡十六國混亂的局面，我們更不忍看見良好的中華國民從此而歸於盡。

時光忽忽，三個月快快的過去了，而天時人事，仍復相逼而來，愈趨愈急。大廈將傾了，我們住在廈內邊的人們，頃刻都有被活埋的可能，而束手無策，坐以待斃，這是多麼悲哀，可憐！

現在整個的國家已陷入阨陁不安的狀態。物價扶搖直上，沒有可能的止境，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如大難之將臨。學潮、米潮瀾漫全國，這都不是偶然的騷動，也是未必見得有甚麼唆使，有甚麼煽動，而是在這個苦難的時代，在這個可怕的局面下所必有的現象。徬徨、苦悶、恐懼、憤懣、怨恨，發之於外者是洶湧澎湃的怒潮，何必唆使，何必煽動？這種現象能使社會愈趨不安，加速崩潰作用。政府如果處理得法，這如火如荼的騷動或者可以平息下去。高壓手段絕對不是辦法。古今中外有多少例子可以證明高壓不能安定社會，縱能得到一時的效果，但將來的反應必然更為劇烈。

我們認為一切的騷動，一切的風潮，都是社會不安定的象徵，而不是社會不安定的基本原因。不揣其本，徒齊其末，不但與事無補，且足助長變亂。最足使我們痛心的是我們的政府不惟不去設法滅除不安的因素，而反要時時刻刻的製造糾紛，製造事故。有能力的政府可以見微知著，防禍於未然；

無能力的政府平時顛預糊塗，遇事手忙腳亂，不知所措，甚而至於庸人自擾，使一個本可平安無事的場合，一變而爲不可收拾的局面。

二

諱病忌醫是最要不得的事。我們的政府偏偏的以諱病爲能事。我們以爲政府若能事事以赤誠與國民相見，國民對於政府的信仰自然也可以增高；就是政府的設施不能盡滿人意，也可以得到國民的諒解。而我們的政府以爲國民盡是傻子，可以欺騙的。隨手翻開一張政府報紙，我們所得的印象是：中華民國政和邦雷，雖然有些地方，小醜跳梁，但不久即可一舉而廓清之，與國家大局，毫無關係；物價上漲，政府自有應付之法；至於各地學潮，大都風平浪靜，即有少數不安分的學生，也絕不能影響『純潔』學生的上課。像這樣的粉飾太平，吾誰欺，自欺乎？欺人乎？我們百思不得其解。欺人的害處小，因爲這年頭真正天真爛漫的人已經不多了。自欺的害處大，因爲自欺的結果政府本身會麻木。真正開明的政府不怕說老實話，不怕老百姓說老實話。自己怕說老實話，同時又怕老百姓說老實話，正是暴露了自己的弱點，自己的無能。中國所以有今天的嚴重局勢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的。好幾年以前已經把種子散播下去了，明眼人早已看到有現在的一天。可是我們政府總是不肯承認如鐵般的事實，到今天不能不自食其果了。

無論怎麼的掩飾，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擺在眼前的是已經接近崩潰的經濟，已經不可救藥的財政，已經不能生活的老百姓，成千成萬流離失所的難民，盪動不安的社會，驚惶失措的人心。如此下去，政府必有垮台之一日，其垮台也，不是由於外來力量的襲擊，而是由於政府本身的腐敗。

政府當局一定要澈底覺悟：今日政治經濟的嚴重性是自己造成的，還要自己下一番切實自我檢討的工夫，痛改前非，策勵將來。中國人民對於政府不滿意，這是事實；但中國人民不願政府垮台，這也是事實。政府垮了台，一般老百姓絕不會有好日子過。因爲如此，所以一般老百姓，一方面對於政府憤懣，怨恨，一方面還是希望政府能振作一下，挽回瀕於既倒。人民對於政府是失望，但還沒有完全絕望。失望容易滿足，『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只要政府能做出幾件差強人意的事來，馬上人心就能爲之一振。如果到了絕望的程度，事情就不可爲了。

三

中國局勢到現在的糟糕，內戰當然要負根本的責任。本刊在發刊之初即主張和平，反對內戰（第一卷第三期）。我們以爲如果內戰繼續的打下去，國家完了，一切都完了。內戰就是自殺。我們呼籲各黨派放棄私見，拿出政治家的風度來，可憐中國，可憐水深火熱中的老百姓，爲國家民族留下一線生機。半年的光陰過去了，到現在和平的希望早已斷絕。我們對於這次參政會所提出的和平方案，我們對於全國學生們所提出的和平口號，表示無限的同情與安慰。但我們却不敢對於這個和平運動抱着很大的期望。和平是全國人民一致的呼聲，其如執國家命運的國共兩黨的主腦人物不肯聽何！然而，這種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是足以寶貴

的。

國內如果可以不打仗，化干戈爲玉帛，一切的經濟政治問題，雖不見得就可以迎刃而解，但困難至少要去掉一大半。內戰繼續的打下去，困難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加深，總有一天甚麼人也不能忍受了。不過眼前的事實告訴我們，不管你怎樣呼籲和平，誰也不會聽你那一套。生爲倒楣的中國人，活該受罪。中國的老百姓誰沒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感！

四

在內戰進行的當中，預算不能平衡，物價不能不漲，民生不能不困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不能希望政府當局有甚麼錦囊妙計，馬上可以把握經濟財政弄好。然而，我們所不解者是許多可以做的事，政府爲甚麼不做？八年的抗戰，跟着就是內戰，生活困苦是必然的事。不過政府如果使全國人民，不論富貴貧賤，有苦同受，有福同享，人民還有甚麼話可說。英國戰時戰後一般人的生活有相當的困苦，可是英國人對於政府並沒有怨言。這是甚麼原故？因其全國上下，貴至國王首相，賤至販夫走卒，受着同樣的待遇，所謂『以直道使民，雖勞不怨』。我們反其道而行，少數人藉着通貨膨脹的機會，藉着特殊的力量，所積聚的財富和在國外的資產，其數量之鉅，已非一般人所可想像。以中國之貧窮，竟能養出這樣鉅富，甯非怪事？南京上海，達官貴人，其生活之豪奢，其享受之裕美，在戰前亦不多見。而一般老百姓，受着層層的剝削，求一飽而不可得。考取的留學生，因爲政府不發外匯而不能放洋，但有勢力的人其子女妻妾老媽子，只要高興，都可以到外國逛一逛。『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中國不平事太多了，焉能不引起反感？實在，中國老百姓太好了，否則，何以能忍受這樣的社會！

到現在，中國的危機已經到最嚴重、最可怕的境地。或死或活全看政府今後如何應付這個危機。

停止內戰是第一要務。但戰爭是雙方的，一方面停，一方面不停，停的方面就等於投降。雙方都有覺悟，都能顧及國家民族的前途，內戰自然打不下去。不然，僅靠呼籲，難期成功。老實說，混亂的局面對於共產黨有百利而無一害。從共產黨看來，混沌就是光明，崩潰就是成功。可是，在政府方面絕對不能坐視局面惡化。

無論如何，政府不能再事因循，再事敷衍。過去所用方法已經辦不通了。安定社會第一要安定經濟。安定經濟第一在制止通貨膨脹。此時需要一個起聳振聳的大轉變，使通貨流速與物價水準有良好的反應，使社會的不平可以稍爲平抑，使一般人心也可以有所振奮。『這個大轉變』，用楊西孟先生的話來說：『除了國內實現和平，就只有決然打破既得利益集團對財政經濟的控制，沒收貪官污吏的財產，並對富裕階級重課租稅。』（本刊十九期論經濟崩潰）

不知道政府有此勇氣，有此決心否！



專論

苦悶甚於饑餓

黃鉅生

——從青年的心理學論學潮——

關於最近學潮的起因，有種種不同的說法。

一說，這次的學潮，是國民黨某派所鼓動起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現在學潮蔓延全國，想收拾也收拾不住了。對於這一個說法，我們不必追求究竟，不問火是誰放的，但看火滿原野，想必原野上全是枯草，草何以全枯，普遍的有易燃性，一點便全着，這是什麼道理？我們要問，各校個別的問題——如校址，如院系，如復校等等——何以變成了普遍全國的學潮？

還有一個說法，說是這次學潮，完全由於共產黨的煽惑，多數的學生，被少數人所愚弄所利用，因此便全鬧起來了。這個說法，我們認為不公、不聰明、不正確。照這個說法，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唆使，這次學潮便不會起事；其實，痛苦到不能忍受，誰都要喊出來，遲早要喊出來，有共產黨的鼓動，固然要喊，沒有共產黨的鼓動，一樣要喊。青年所感的痛苦相同，於是纔一呼百應。事到如今，青年的怒吼，是意中事；不怒吼，那纔是怪事呢，共產黨不共產黨，並不吃勁，我所謂不正確者在此。

把學潮的責任，都寫在共產黨的帳上，並不減輕政府和教育者的責任。這樣的說法，既不足以折服青年，又不足以使一般人相信，企圖卸責而又無人相信的話，聰明的人決不說。

要說少數有作用的人，脅迫或誘惑了多數純潔的青年，而成功這番普遍全國的風潮，這未免將有作用者估計過高，將青年估計過低。不錯，這次的學潮的口號——反饑餓反內戰——平、津、京、滬、武漢、蘇、杭、全一致，發動的日期，也前後相接，這其中必有人主使策動；主使策動，容或有之。但是我們要問，如果沒有刺激青年的情境的存在，策動何以如此順利？主使何以如此成功？口號如果不是心坎的話，口號如何喊得那麼響？說多數青年受人利用，說多數青年盲從，說多數青年一味感情用事，這都是不公道的說法。如果青年內心感痛苦，而不許他們喊出來，如果小喊無人理，大喊起來了，而責以請願的手續不合，這也不公道。

如果引用不公道的原則，反詰青年，政府未嘗不振振有辭。說公費是政府給的，而學生反向政府吵鬧；公費出自人民的血汗，學生何以不體恤人民？公立的大學生，大多數有了公費，以致中學小學反而無力照顧；學生的公費政府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一個大學的公費，已多過一個士兵糧餉。……提到內戰，政府何嘗願意內戰，內戰與政府有害無益。政府爲了保護人民，安定社會，不得不超而應戰。戰爭是兩造的對抗，何以青年學生，祇向政府要求停止內戰？在政府所控制的都市裏，集衆遊行，與維持治安的警憲衝突，這不是擾亂秩序，幫助共產黨，以達到他們推翻政府，武

力奪取政權的目的麼？

這一番反詰，青年學生也可以提出許多有力的駁辯，但是這不是一篇辯論會的記錄，反覆的話難也無須多說了。而且事到如今，針鋒相對的講理，是說不完說不清的。我們無妨將青年對政府、對現狀、對時局、對自己切身問題的態度，揣測幾點出來，作為善處學潮的依據。

老實說，青年對政府不滿，不滿雖然不滿，要說推翻現有的政府，讓共產黨執政，這又不是多數青年所贊同的。青年也知道，一但共產黨當權，經濟的平等就說可以辦到，而政治的自由，絕對不可能。多數青年，並不贊成共產主義。把反對政府的，一律看成共產黨，這是絕大的錯誤和冤枉。青年向政府請願，正是傾向政府，而不是反對政府，難道政府真要青年向共產黨去請願麼？把共產黨看成政府的敵體——承認他是另外一個政府麼？孩子們有苦，自然要投到爺爺懷裏去訴苦，政府要有這種雅量，將青年看成自己的子弟，許他們哭，許他們喊，學潮就可以平息大半，北平的學潮，處理得比較得當，就是一個好例。

激烈的青年，當然也有，但是激烈者之所以能號召大眾，正因為他們所喊的口號，能打入大眾的心坎。口號「反饑餓」，饑餓是事實呀。口號「反內戰」，內戰是饑餓的造因，這也是顛撲不破的道理呀，要餓，大家都餓，氣也可以平，為什麼有人魚翅吃得發膩，有人連四凹頭（北方平民的食物，穀麵作的）都吃不上？要打就趕快打，速戰速決，為什麼誇下大口，幾月打通津浦線，幾月打通平漢線，如今一點也不能實現？戰既不决，為什麼又不講和？肅清貪污，一致的呼聲，滿口的答應，然而貪污之風愈來愈猖狂，不是察不出就是察出了，也諱莫如深，好像不說出來，就沒有這回事似的。要肅清而未減少，是無能；說肅清，而不肅清，是無心。請問政府近來辦了甚麼貪污的案子？取締豪門資本，勝利以前直到如今，國民黨的集會，政府的集會，那一回不曾決定？一次、兩次、三次的決議，而今作到一點沒有？以緩和的方式，用美金公債來吸收豪門所掌握的外匯，是否吸收了分文？

這些都是使人憤慨的現狀，而熱情的青年，尤為憤慨。現狀極壞，而

政府却拚命的要維持現狀，政府好像要賭自己的存在，去維護貪官污吏和豪門資本，什麼投鼠忌器的道理，決非青年所能了解，亦不足以平服青年的憤慨。

憤慨之極，青年就要革命，所謂革命，即是劇烈的變動，青年憤恨現狀，厭惡現狀，青年不顧一切的要求「變」，變一變就好，變好了固好，變壞了也比不變強，這是青年的心理——一種有強烈情感荷載的觀念，是不可以理喻的，患牙痛的人，痛不可忍，將牙拔去，拔牙是以痛止痛。青年求變的道理如此。頭痛的人，到了痛不可耐的時候，恨不得將頭砍去，頭砍了，活不成。但是也恨不得砍，這是青年不可理喻的心情。

這種心情，祇有事實可以糾正，政府能打幾個勝仗，或斷然言和，特別是對於貪污，對於豪門資本，作幾件出手的事，青年的氣憤，自然可以緩和，學潮也可以不熄不息，如果現狀毫無改進，或者改進祇是空話，那麼縱使這次的學潮平息下去了，未來的學潮，會屢出不窮，接踵而至的。

至於青年本身問題，反到容易解決。青年喊饑餓，所喊者是自己的饑餓，也是一般人民的饑餓。如果大家去吃鍋鍋頭，四萬八千元的輔食費，目前也可以够。如果還有人吃魚翅吃得發膩，就十萬五千元輔食費，也决不够。我們要承認青年本身，苦悶甚於饑餓，饑餓是事實，同時也是苦悶的象徵。國事如此，看不出些許的光明，自己的前途茫茫，作什麼好？在這個價值混亂的時代裏，在這個是非不定，黑白不分的國度裏，精神上憑藉什麼，依靠什麼，想什麼好？鍛鍊身體麼？幾乎二十分之一有肺病，（這是可靠的統計），求知識——現代的知識，世界的知識？跑到大學的圖書館去，有什麼雜誌，有什麼一九三七年以後出版的書籍？跑到實驗室去，有什麼儀器藥物？所謂求學，祇是聽那些未吃飽的教授空口說白話，重複他們十年前講稿，說是書籍、雜誌、儀器、藥物、需要外匯纔買得到，而政府沒有外匯，那麼學生們要問，一九四七型的汽車，怎麼就進口了，可憐，一個新汽車所費的外匯，就可以設備一個實驗室，就可以買一千五百本新書。上海一地的新汽車，就可設備全國各大學的實驗室，充實全國各大學的圖書館而有餘。設備設備，外匯云乎哉；圖書圖書，外匯云

乎哉？

總括一句，要消彌學潮，治標的辦法是「果其腹」，治本的辦法是「平其氣」。既果其腹，又平其氣，使青年有書可讀，有實驗可作，有前程

可以希望，你看全國的青年，個個是國家有用之材，個個都是國民政府的擁護者。

x x x x x

從「知難行易」學說的評判

樊弘

說到國民黨今後的出路

現在中國竟有不少的哲學家，知識青年，和國民黨黨員的大部，都一致相信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是一種革命的哲學。並且以為自從民國成立以來，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完全是由中國的朝野上下，特別的是國民黨的黨員，不知「知難行易」的學說使然。北大賀麟教授，在他的「當代中國哲學」裏，亦曾有同樣的見解。他說，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的目的。在掃蕩幾千年來深入人心的畏難苟安的積習，破除知而不行的偷惰的心理，同時並鼓舞力行的勇氣，求知的決心，恢復民族自信心，展開民族前途的希望，指示我們的新文化應循科學化、工業化、民主化、社會化的途徑邁進。

反過來說，就是中國的新文化，今日之所以不會真正的向着科學化、工業化、民主化、社會化的途徑邁進，主要的是由大家不明白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哲學的原故。我不否認上述的見解含有部份的真理存在。但我以為中山先生的知難而行易的學說，在他的主要意義的範圍內，不但不是一種有助於革命的哲學，而且含有極大的危害革命的玄想的成份在其內。除非將這玄想的成份加以破除和掃蕩，我以為中國革命的前途必定無望。

只要我們不是存心騙自己，我們必定不會否認這一顯著的歷史公律：即在人類社會生活範圍內，根本沒有所謂全知全能的偉大人格存在。而且

越是偉大的人物，其所犯的錯誤往往亦越是偉大的。舉例來說，德國耶拉大學的黑格爾大師，該是世界上最大的哲學家了。但他在政治哲學上，却認為普魯士的專制的政體，乃是人類自從有史以來，最高無上的一種典型的政體。這當然是一種極荒謬的見解。又如英國劍橋大學的物理學家牛頓，該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學家了。但他在光學上的意見，竟阻撓了近代光學的進步幾約半世紀。從近代人物的眼光看來，當亦不能說他的光學見解是正確的了。這種同類的例子，在郭任遠教授所作的「最大的科學家所犯最大的錯誤」一文裏，搜集的材料極多。為減少人類歷史上偉大錯誤的重演計，儘管我們都是中山先生的學生，但我們對於他的知難行易學說的正確與否依舊要加以檢討。我們的態度是，如用蘇格拉底的用語來表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我以為，在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內，含有兩種冰炭不容的見解。其一是合理的和革命的。又其一是不合理的和反革命的。前一種是說，知道或發現行為的原因比較行為自身更困難。後一種是說知識是支配人生行為的中心勢力，因此，知難行易的哲學便是支配人生行為的中心勢力了。在這兩種見解之中，中山所着重的是第二種。但可惜中國這幾位有名的學者，如胡適大師，馮友蘭教授，賀麟教授和傅銅博士所反覆討論的，只是中山的第一種見解。這不能說不是一種缺憾了。為補足這個缺憾起見，我願大

胆的對於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中的第二種意義，加以分析和評判。

關於知難行易學說的第一種見解，我以為只須幾句話便可說明白，實無須以盈篇累牘的洋洋洒洒的宏文巨論，來反復的推敲和辯論。中山先生在他所舉的各種例子之中，曾經一再明白的說，知道行爲的原因實在比較知道行爲自己更困難，反之，知道行爲自身實比知道行爲的原因更容易。因爲任何行爲自身在任何一人的知識經驗內，如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使用無線電和作豆腐各事，中山在舉例的時候便假定他們是屬於人類已經知道的事情。反之，行爲的原因，如食物化學、貨幣原理、文法學、建築學、造船學、土木工程學、電磁學和有機化學，中山先生在舉例的時候，便假定他們是屬於人類未知的事情。在事實上，未經知道的事情，當然比已經知道的事情困難。反之，已經知道的事情當然比未經知道的事情容易。由此可見，知難而行易的學說的第一種解釋幾是一種自明的公律。它不外是說，未經知道的行爲的原因實比已經知道的行爲自身更困難；反之，已經知道的行爲自身實比未經知道的行爲的原因更容易，這種解釋千真萬確，自足於內，毋待於外。縱有胡適大師，傅銅博士，和馮友蘭教授的反駁，和賀麟教授的守衡與發揚，當亦不能增減它的真實價值一絲毫。這是我不能不擬討論這一部份的見解的理由。

關於知難行易學說的第二種見解，即知識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勢力，因此，知難而行易的學說便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勢力了。我以為這可是一個驟看極難，細想極易解答的大問題。知識果是支配人生行爲的中心勢力嗎？中山先生毫不遲疑的答覆這個問題說，是的。且看他說：

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余乃不禁興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爲建國計劃，舉而行之，以冀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焉。乃有難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遠矣；先生之策，闕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何？予初聞是言也，爲之惶然若失。蓋行之維艱一說，吾心亦信而無疑，以爲古人不我欺也。繼思有以打破此難關，以達吾建設之目的。於是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勸同人。惟久而久之，終覺奮勉之氣，不勝畏難之心，

舉國趨勢皆如是也。予乃廢然而返，專從事於知易行難一問題，以研究其究竟。幾費歲月，始恍然悟於古之所傳今人之所信者，實似是而非也。乃爲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爲易，以行爲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可爲矣。

由此可見，中山先生蓋真以爲自從民國成立以來，中國建設事業之不行，係由國人不知知難行易之真理使然。倘能知之，則中國之一建設事業，亦不過反掌折枝耳。亦就是說，知難行易之學說是推動國家建設的中心勢力。昔日建設事業之不進行，或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係由國人不知知難行易的真理。今後之建設事業必定成功，是因知難行易之真理，已爲先生所發明，並爲大眾所領悟。故今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其成功必較革命之破壞事業尤速尤易。依據中山先生的分析，國民今日之未能切實實行三民主義，主要的是由他們不知三民主義足以適應世界之潮流，而「謂予之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及其既知而又不行者」則又係由爲「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爲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今舊說既除，大敵已破，國人必將依據知難行易學說的指導，萬衆一心，疾起直追，以最快速度將中國建設而爲一爲民所有、爲民所治、並爲民所享的三民主義的國家。回憶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之說，係脫稿於民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在民國七年以前，中國未親建設事業之進行，我們固可以有理由說，這是由於傳說的知易行難之說，在與中山的建設事業爲敵。但自民國七年以來，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之說已成，它不但已成爲國民黨的共同的信仰，並且得到了美國的實證主義大師杜威博士的印證，北大哲學系賀麟教授的發揚，和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先生的推進，並得到了國民黨內外的三民主義同志的竭誠擁護，宜乎中國之建設事業，會依照知難行易學說和三民主義所指示的途徑，並以最快速度，將中國化爲一富強康樂的民治、民有、民享的三民主義的國家了。可是，現在怎麼樣呢？它是否比較民國七年更要紊亂呢？假令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英靈

肯從天國祥雲的開處，以聖潔之光，照射塵寰，一觀今日中國之貪污氣，殘酷內亂，和今日的國民經濟的整個崩潰下的饑饉、流亡、與貧乏，再回顧他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所應有的理論的效果，我想這位慈祥誠懇的老人，一定要痛哭零涕的說：「我的理論是徒然的！」我看，歷史上沒有一種哲學，有比中山的知難行易的政治哲學，在鐵打的事實面前，被粉碎得更無救的。

從社會經濟的觀點看來，人的實際的行為，在根本上，不受他所崇拜的理想或知識支配。他既不受傳說的知易行難的學說支配，亦不受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支配，而係受他的直接取得收益的方法，資本、土地、或勞動支配；或間接的取得收益的方法，如貪污、買辦、詭媚統治者階級和帝國主義的行為支配。我的意思是說，人在實際生活的時候，無論他所崇拜的是什麼美妙的主義，他於不知不覺之中，都要把這個主義來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配一配。如果這種主義，對於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的保持和擴大是有幫助的，他便要用它。沒有幫助，他便不用。如果它是有害於它的維持與發展的，他便要怪它、恨它、欺它、侮它、甚至要賊害它，至少他也要對它施展一點陽奉而陰違的手段了。同時對於創造並力行這種主義的人，不問你是蘇格拉底或柏拉圖，耶穌或孔子，馬克思或孫中山，假令你在力行主義的時候，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的維持與發展有幫助，它便要認你為他的很忠順的奴僕或領袖。反之，如果你在實行主義之時，與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有妨礙，無論你是他的父親或兒子，丈人或女婿，他都要對你毫不客氣了。願拘則拘，願打則打，願宰則宰。至少，他也要對你貌似誠懇而心則極狠毒了。歷代古先聖賢的學說之所以不能實行，原因在此。

以中山的三民主義來說，第一、在民生主義裏面，他的主要的目的便是要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這種目的的實現，直接的與大地主和大資本家的憑以取得地租利息和利潤的方法土地與資本的積聚相衝突，當然地主和大資本家為圖保持和擴大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法土地和資本計，勢必便要被迫而與民生主義為大敵。第二、在他的民權主義裏面，中山極力主

張以人民的權力來監督政府。這種思想在實際政治上的效果，便是要肅清中國的官僚階級。用具體的話來說，就是要肅清政治上的貪官污吏。除非官僚階級是傻子，他們為了實現他們的陞官發財的目的，當然亦必起而與民權主義為大敵。第三、在民族主義裏面，中山力言中國要為中國的人民所有。對外要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要肅清中國的買辦的階級。此時，買辦階級與帝國主義，為了維持和擴大他們的剝削殖民地的利益的侵略關係起見，當然他們亦將被迫而與民族主義為敵了。由此以言，中山主義的最大的敵人，乃是在他們的財產關係上，與中山主義立於對立地位的大地主，被節制的大資本家，特別的是官僚、軍閥、買辦、帝國主義和他們的同路人等輩。為力圖革命之成功計，我以為中山先生當年似乎應當排除在財產關係上與中山主義立於對立地位的敵人，結合在財產關係上與中山主義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同志或同道，以為建設三民主義國家的基石。最可引為不幸的，即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事業受阻之際，在尋求革命失敗的原因上，竟不知道阻礙他的革命事業的敵人，是那些在財產關係上，與他的主義立於對立地位的假革命黨人或反革命的黨狗。但認為阻礙他的革命工作的最大的敵人，是在財產關係上與他的革命事業毫不相干的傳說的知易行難的學說。且看他說。

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百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祇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僅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是故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

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

中山先生既認為傳說的知易行難之說，纔是他的敵人，當然，他不認為國民黨內外的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奸商、買辦、和帝國主義的爪牙與其同志，是他的敵人了。在他方面，中山先生既認為知難行易之說，纔是他的敵星，他勢必便要放棄，在取得收益方法的關係上，去尋找三民

主義的真正的同志的企圖了。最可引為不幸的，這些三民主義的真正的敵人，因為中山先生的不注意，也都先後滲入了中山先生的革命大本營中，然而中山先生却又鮮有真正的同志作戰士，莫怪他的理想會失敗了。

回想中山先生的革命目的，依據國民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乃在「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工具，首為國閥，次制官僚、土豪買辦階級。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之軍隊，二曰造成廉潔之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新興工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扶植其發展。」但因中山先生與其同志在實行革命的時候，相信知難行易之說，以為知識是支配人生行為的中心勢力，一開始便向帝國主義者，並其工具，軍閥、官僚、土豪、買辦階級宣傳說，「你們昔日之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和軍閥、官僚、土豪、買辦，均是由於你們不知信仰三民主義並知難行易學說。假令你們知道了，你們立將自發的不復再作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和買辦了。」帝國主義者的工具：與買辦們，眼見革命勢力之不可以力拚，然知能以智取，於是盡皆立即粉墨登場，搖身一變，變作無量無限之三民主義信徒和知難行易學說的戰士，一一請求入黨。革命黨人因為他們的革命對象都入黨了，或感化了，遂以為他們的革命成功了。焉知入黨之後，他們因為既得權利的關係，祕密聯合起見，採取極卑污和極陰險的手段，竊取政權。或為部長或為秘書，或為參謀，或為長官，在表面上，他們還是三民主義的戰士，可是他們在暗地裏，為鞏固他們的既得利益與權利計，幾乎無時無地不在破壞三民主義。積年累月之後，他們深知他們自己的羽翼已豐，實力雄厚，竟敢公開行劫，為所欲為，其為軍閥、官僚、土豪、與買辦也，更且甚於往昔。黨在這種組織之下，革命目的萬難實現。

但在海禁既開之後，中國的政治和法律，除了土地之外，尚須便利外資和買辦資本的積聚。在海禁未開以前，中國的官僚階級是與地主階級的利益相一致的。在海禁既開之後，在中國官僚之中，加入了一批留學生去作新官僚，他們的利益乃是與帝國主義者和買辦階級的利益相一致的。兩者均不需要民主政治，這是中國的民主政治遲來遲的原因。同時也是中國的官僚政治，保持不墜的原因了。在辛亥革命的前後，與民主政治有生死存亡的關係的，主要的是那些打算前來開發中國的華僑中的資本家階級。這些華僑資本家，雖係民主主義的障礙物，但他們却是推動中國民主勢力的主力。此外便是中國的進步的小資產階級和進步的工人與進步的農民了。國民黨假如及早便死心踏地的與這些人聯合在一起，而與其他反民主的因素相決鬥，給中國新興的資本家掙扎一條光明的道路，未始不易成功。無如當時孫中山先生，在他的思想裏，含有不少中國儒家思想中腐朽的成份，是即好人政治的哲學，誤以為儘管在取得收益的方法與民主主義立於正相反對的人物，均可以實行民主政治，只要他們肯向民權主義宣誓。莫怪他們後來要叛黨了。

假如今日全中國的國民並國民黨，認為三民主義必須付諸實行，始足以臻中國於富強，那末我敢斷言，今日的國民黨的機構，在理論上，絕非實現三民主義的工具。國民黨的偉大領袖孫中山先生，是即我所最崇拜的全中國的精神之父，因受他的知難行易之說所蒙蔽，其實是整個儒家哲學的蒙蔽，誤信食人無厭的豺狼與虎豹亦可受知難行易學說的感召，自動的拔去他們的牙爪，而與國民黨的主義共生死；致將無限量的官僚、軍閥、土豪、買辦介入國民黨中作同志，並各分據要津，已使三民主義的實現陷於不可能狀態。除非國民黨的真正同志通通死了。我以為，他們為了保持國民黨的光榮歷史計，早遲必將國民黨重新改組。現在我以第三者的地位，希望他們改組的時候，不要重蹈過去的錯誤，再從一個人的空洞信仰上，去判別此人對於三民主義的仇友的關係；但從他的取得收益的方法上去判別他。讓敵人滾開，讓同志回來，並對敵人施以相當的壓力，重新掌握政權，見寇顧犬不晚，亡羊補牢不遲，在消極的方面繼續與封建勢力和

帝國主義爲敵；在積極的方面並繼續領導全中國的進步的小資產階級和勞苦大眾，以追加的速度，將中國建設而爲一爲民所有，爲民所治，並爲民所享之三民主義共和國。假令這個目的達不到，縱令內戰成功，並且縱令

青年、民社兩黨可與國民黨永久的合作，除非中國不進步，國民黨終必要爲時代進化的浪潮所粉碎。

三六年四月廿六日於北大

論杜魯門主義

王遂今

自華盛頓傳來的消息說：「美政府現企圖將杜魯門主義之重心，由反共十字軍之理論，轉受爲重建西歐及遠東民主之經濟措施。」

杜魯門主義，從一個單純的反共觀念轉變過來，這是很可注意的事。

名政論家李普曼還透露政府的計劃說：「美國政府於今後十二個月內，將不得不恢復某種形式之租借制度，每年所需經費，至少當在五十萬萬美元，以解救世界之經濟危機。」

這種見解，是因爲艾克遜宣佈杜魯門主義五項計劃後而發生的，據李普曼說，這五項計劃，實爲那個大租借制度的第一步。

在這種遠大的見解之下，已令世人對杜魯門主義的印象好轉，而且發生新的希望。這種印象不外：

第一、杜魯門主義不光是要造成反共壁壘，而且希望要復興世界經濟，重建世界民主。

第二、不光是消極的軍事的援助，而且希望是積極的經濟的扶植。

第三、不光是予某些國家的「政權」以支持，而且是對這些國家的「人民」以救濟。

第四、以租借制度爲形式，以復興民主世界經濟爲號召，表示這是羅斯福的遺規，這不是金元帝國的政策。

杜魯門主義的這種轉變，而產生這種遠大的見解，顯然是受了華萊士之奔走呼號的影響。

華萊士主張「美國應利用另一種權力，以建立世界繁榮，增加生產」

，藉以阻止「蘇聯的擴張野心」，因爲「在繁榮的世界上，共產主義將無從插足」。——這與白宮最近的見解，「減少西歐及遠東的共黨勢力之最重要方法，即爲使該處各國經濟上可以自立」，如出一轍。

華萊士又主張以數十百億之鉅款，實行復興世界的計劃，杜魯門現在似也將走這條路線。

華萊士主張實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特別是不虞匱乏與無所恐懼的自由，他又稱頌羅斯福的戰時租借制度，認爲是一改金元外交的作風。——這些，在以上的遠大見解之下，表面上似乎也爲杜魯門所接受了。

因爲華萊士奔走呼號，對美國的輿論影響很大，對世界各國人民的印象尤深！白宮的政策不敢不顧及輿情，所以他必須消除杜魯門主義的帝國主義色彩的痕跡，同時沖淡反共觀念的嚴重性。

華萊士一再警告，如果美國光以軍事援助反共國家，而一任其人民貧窮、生產停滯、失業增加、經濟崩潰，則不但不能消滅共產主義，而反足資以增強共產主義的發展；而且在此種情形之下，一個健全的民主政府也不可能存在。這種警告，是使杜魯門主義由單純的反共觀念轉變過來的動因之一。

但是當然，杜魯門主義仍舊是杜魯門主義，決不會變成華萊士主義；而且這種轉變，雖然像是接受了華萊士的原則，而實際上華萊士對於杜魯門主義，引爲憂慮之處仍沒法轉變。

第一，美國未來的所謂租借制度，是把蘇聯及其衛星國除外的，這就

是說，這種大規模的復興計劃，是一個包圍蘇聯的經濟鎖鍊！那末，「天下一家」的理想還是遙遠得很，仍然造成分裂的兩個世界。

第二、在所謂五項計劃中，最主要的是「單獨推進復興德日兩國之工作。」對於此項工作，特別為美國所重視，譽為「東西二大工廠」，「兩國之建設，乃歐亞兩大陸最後復興之所繫。」顯然地，美國將以之為對付蘇聯的東西兩個有力的籍。這實在是一個危險的試練！美國縱然沒有鼓勵戰爭之意圖，但是德日兩國是著名的好戰民族，乃非愛好和平國家所能了解的，實不能予以任何「敵對」的鼓勵，徒令其驕武的死灰復燃！結果是造成戰事。

第三、經濟援助的前提就是軍事援助，所以這種經濟援助，以復興西歐遠東各國的計劃，必定帶來了干涉各國的內政，經濟以外，還不免政治軍事的干涉，干涉的結果，不能避免遭受帝國主義之譏。假如純粹是經濟的援助，而與政治軍事絕緣，帝國主義的誤解方不能發生，所以美國的這種以軍事為主經濟為副的援助，可能招致各國人民的厭惡，結果連經濟的意義也為之減色。

第四、美國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作風，已置聯合國機構於一個毫無作用毫無力量的地步，而聯合國的理想也將束之高閣。要求世界的和平繁榮合作，祇有加強聯合國機構纔是正途，兩次大戰可以說也就是追求這聯合國理想。美國應該通過聯合國機構，以建立世界和平。如果說聯合國對於制止共產黨主義這項行動性的任務是無法負擔的；那末，現在杜魯門主義要轉變為復興世界經濟，要以數十百億貸款給貧窮的各民主國，這項任務何故聯合國機構不能為之？要是聯合國能有力復興世界經濟，那末

它也方有力量消弭共產主義，達到世界的和平合作。

如果杜魯門主義僅僅止於軍事援助，僅僅只有反共十字軍的理論，我們可以不論，現在杜魯門主義既有「轉變」為復興世界經濟的計劃，則我們希望這種大規模的經濟計劃，最好遵守幾個原則，方不致白費心思！

第一、美國的租借制度，毋寧通過聯合國機構來執行。

第二、經濟援助各國必須與軍事政治絕緣，純然是技術上的生產上的援助，以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為目的。

第三、德日兩國祇能給以有限的經濟救濟，不能令其有重工業存在。第四、蘇聯亦應包括在經濟援助之內，戰後蘇聯的經濟情形也很惡劣，從經濟援助中可以促進對蘇的了解和合作。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還在第二點之經濟援助應純然為技術的、生產的。比如說，美國以大量曳引機供給西歐與遠東，則農田就可有進步的改革，農業機械化起來，糧食生產增加，農民生活改善，共產主義對於農民就不再發生吸力。又比如說，T.V.A. 的制度推行到各國去，推行到國際河流域上去，T.V.A. 制度的好處就在其純然是事業化、專門化，本身沒有政治作用，而實際的結果常能消弭政治問題於無形。改善生活，增加生產，人民是不會拒絕的，改善生活增加生產之後，共產主義也將無法發展。

這些，正都是華萊士所曾經想到的。華萊士，決不是一個同情共產主義者。反之，他還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維護者，他的理想是繼承羅斯福的。杜魯門主義如果說已受了他的奔走呼號的影響，那我們希望杜魯門主義更接近於華萊士。

管衛與教養的消長

吳景超

抗戰期內，我曾有一個機會，在江南各省，視察行政的工作。到了廣東的曲江，那時的省政府主席，曾邀集了各廳的廳長，以及各部份的主管

人員，同我們開了一個座談會。省主席問我們視察之後，有何觀感。我記得曾提出一個意見，就是請各級的地方政府，多花些錢在教與養上面，而

少花些錢在管輿衛上面。

這個意見的後面，藏着一個對於地方政府的看法。地方政府，是社會組織的一種，是與其他各種社會組織，如經濟、家庭、教育、衛生、宗教等并立的。每一種社會組織的存在，都是因為他能滿足人民某一方面的需要。在不久以前，人民對於地方政府所要求的，就是維持社會秩序，讓大家以安居樂業。這種政府，西人稱為警察式的政府，但在中國，素來沒有警察的組織，我們無妨改稱為包公式的政府。包公是一個鐵面無私的法官，凡是看過中國舊戲的老百姓都知道的。他們就希望政府裏有像包公這樣的一個法官，當他們受到欺侮的時候，可以到他那兒請求主持公道。人與人相處，難免有爭執發生，為消滅這種爭執，使社會的秩序不致紊亂，包公式的地方政府，是有其存在的必要。但是根據老百姓的經驗，包公只能在舞台上看到，實際的縣老爺，其行為每每與包公相反。所以他們遇到有衝突的事故發生，常常請鄉里的父老或公正士紳來評判，即以他們的評判為行為的指針，而不到縣城裏去打官司。在這種情形之下，地方政府只是一個收稅的機關，其存在與否，對於老百姓已經沒有多大關係。

就在這種無為而治的狀況之下，我們的地方政府，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內，突然改觀。這種以新姿態出現的地方政府，是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憤懣的。他覺得這個新的地方政府，與以前不同的，就是常常向他要東西。以前，他在交糧納稅之後，就沒有人來打擾他，現在可不行了。鄉長、鎮長、保長、常常上他的門，今天問他要錢，明天問他要米，後天又問他要乾草，要木料，要桌椅板橙，要這樣，要那樣，使他每年的收入，要拿出一重要的部份，有時甚至是一大部份，去獻給政府。這是使他生氣、憤怒、詛咒的。其次，更使他討厭的，就是在要東西之外，還向他要人，名之曰抽壯丁。中國的老百姓，除了少數的地區以外，多數的人，對於當兵是頭痛的。在抗戰期內，當民族意識高漲的時候，人民為與暴日作生死的鬥爭，只好忍痛送子孫上陣。抗戰勝利之後，抽壯丁的工作，老百姓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情的。

這些使人民討厭的事，都是經過地方政府的機構辦理的。人民於交錢

、交物資、交丁的時候，有時也會敢問，「這是幹什麼的呀？」「你們拿了我的錢去，拿了我的東西去，拿了我去的人去，你們是去做什麼事呀？」這些問題，是必須答覆。近來政府的答覆，是「推行新縣政。」新縣政的內容，就是管教養衛四個大字。

你去向老百姓說，我拿你的錢，為的是要管你。這個答案，老百姓是不能滿意的。他無須你去管他，反對你去管他，因為他看不出你去管他，對他有什么好處。現在各省的縣級以下的地方政府，向老百姓收來的錢，大部份是拿來開支縣級以下的公務人員的薪津與生活津貼的。老百姓實在看不出來，為什麼這些人的生活，要老百姓來負擔。他們為什麼不去耕田，不去做工，要坐在縣衙門裏，要坐在鄉鎮公所裏，等老百姓去供養。

你又去對老百姓說，我拿你的錢，為的是要保衛你。老百姓向四周一望的確有強盜，有土匪。但是他心裏却有一個解決不了的疑問，就是在十幾年前，在未推行新縣政的時候，為什麼沒有強盜，沒有土匪。這些強盜土匪，是從那兒來的？是誰使他們變成強盜土匪的？這個問題，他知道地方政府的衰微諸公，沒有人回答得出來的，所以他只放在心裏，沒有開口。自衛的經費，當然是要交納。交納的結果如何，我們也聽到許多報告。某處的一個老百姓說，九月初旬，某氏在三江市附近，因勸匪失利，遷怒民衆，大肆屠殺。同月下旬，在抱羅市附近，與匪作戰，損失輕機槍兩挺，步槍二十餘枝，脅迫當地民衆，賠償七十萬元，始得無事。又有一個鎮上的老百姓說：一個月以前，本鎮南柵礮米廠經理家遭劫，當匪徒正在搶劫時，有人乘隙逃出，趕到公安局報告，但公安局藉口防盜是自衛隊的責任，所以寫一條子，差警察送往自衛隊部，請其出來捕盜，但警察害怕在路上遇見匪徒之崗哨，不肯執行命令。推遲很久以後，自衛隊始得悉，趕往出事地點，那時匪徒早已逃之夭夭。在過去許多劫案中，二次有人向公安局告密，有幾次出事地點，就在礮堡附近，但都沒有捕獲匪徒，也沒有趕走匪徒。這位老百姓報告了這些事實之後，還發了兩個問題：「請問公安局和自衛隊，是否有防盜的責任？治安當局，是否可以容許這樣的情形繼續下去？」

第二個問題問得很好，老百姓出了自衛費之後，有權利問這樣的一個問題。可是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知道治安當局，沒有幾個能够回答得令人滿意。我曾同好些縣長與專員討論這個問題，只有一個專員的答案，很深刻的印在我的腦海中。這個專員的管轄區域，在安徽的黃泛區內，依理，在這種災區內，治安是不易維持的，但他告訴我說，在他的專員區內，沒有盜案發生過。我問他用的是什麼方法，他說，在抗戰勝利之後，他盡了最大的力量，協助附近的一個大煤礦復工。這個煤礦，及其附帶的運輸事業，製造事業，解決了將近十萬人的生計問題。災民都有飯吃，所以強盜也就絕跡了。

他的答案，使我深信中國的強盜與土匪，不是勸得盡，打得完的。只有發展生產事業，使大家都有工作做，都有飯吃，才是維持治安的根本辦法。不在這種根本要圖上努力，只去問老百姓要錢來辦保安隊、自衛隊，一定會發現土匪愈勸愈多，最後因為人民不勝負担之重，棄農為匪，保安隊與自衛隊，也因給養無着，加入土匪集團，那時的治安，才真不堪設想。

現在可以回到我在上面提出的問題，就是我們對於地方政府的看法。我們以為現在的地方政府，不只是為維持社會秩序而存在，並非為擁護某一政權而存在，更非為剝削民衆而存在。他是為服務人民而存在的。有好多對於人民有利的工作，由人民自己去辦，是不經濟的，或不易辦成功的，但如用地方政府的力量去辦，則易發生效果。這一類的工作，是很多的，因時因地而異。而在今日的中國，地方政府可以舉辦的，對於人民有利的工作，莫過於教育、衛生、及農田水利，也就是新縣政中所謂教與養的工作。

新縣政之所以失却民衆的信仰，就是因為過去他所努力的，是在管與衛的上面，而忽略了教與養的重要。管與衛的花錢，應有一定的限度。如超過這個限度，則管與衛的工作，乃是維護政權的工作，或是剝削民衆的工作，對於民衆的幸福，不但沒有貢獻，反而成為民衆生活中最大的災難與禍害。上一個月，我曾到北平的附近一個縣份去參觀，在途中，我們找

到一個鄉鎮公所的幹事，問他最近做點什麼工作。他說，在過去兩個星期之內，我們金體的職員，一共八個人，只做了一種工作，就是替軍隊向老百姓去徵馬料，徵柴草。鄉鎮公所的幹事代表管，馬料與柴草代表衛，管與衛的合作，老百姓只有頭痛。

管衛風行，教養消沈的現象，在中國的今日，與我數年前在廣東談話時一樣，是很普遍的。我手邊有江蘇沿運河綫某一縣的預算，其中行政支出，佔整個支出百分之二三點四；生活津貼支出，佔百分之四四；保安支出，佔百分之三點一。這三項支出，是代表管與衛的，共佔整個支出百分之八七點五。另一方面，教育文化支出，佔百分之二點八；經濟及建設支出，佔百分之三；衛生支出，佔百分之二點二；社會及救濟支出，佔百分之點八。這四項支出，是代表教與養的，共佔整個支出百分之六點八。管與衛在一方面，教與養在另一方面，在縣政府的支出中所佔的百分數，就有這樣顯著的不同。這個預算，是富有代表性的，不只一縣如此，很多的縣份，都是如此。這還是指正式的開支而言，如將非正式的攤派也算進去，管與衛的花費，其所佔的百分數，一定還會更高。

我們的希望，我們的要求，我們的理想，就是上述的現象，有一天會倒過來。有一天，教養風行，而管與衛却消沈了，這是老百姓所需要的。地方政府如做到了，才算是真能滿足老百姓的需要。

這種理想，並非烏托邦，凡是上了軌道的現代政府，都是以我們的理想姿態出現的。

我手邊有英國的克市一九三八年預算，全年的支出，是四十四萬鎊，其中並無類似管的支出。保安支出，只有兩萬四千鎊，佔總支出百分之五點四。其餘的支出，盡花在教育、救濟、娛樂、公路、衛生、住宅等上面，也就是花在教與養的上面。

我手邊又有美國一九四二年地方政府的經常預算。各級地方政府在那一年的支出，共為七十一億，其中管的支出為七億二千萬，衛的支出，佔七億五千萬，每項支出，都在百分之十左右。但教育的支出，佔二十二億，衛生的支出，佔七億六千萬；社會福利的支出，佔十二億；公路的

支出，佔八億。以上四項支出，是屬於教與養兩方面的，每項的支出，都比管或衛的支出爲多。

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之間，那時正是第二次歐洲大戰的前夕，擴軍已在開始，但英國的各級政府，在社會福利及社會勞務上所花的錢，佔國民收入百分之十三，在普通行政及國防上所花的錢，只佔國民收入百分之九，在同時期內，美國各級政府，在社會福利及社會勞務上所花的錢，佔國民收入百分之八，在普通行政及國防上所花的錢，只佔國民收入百分之

政治上的神經病

錢實甫

神經病是害不得的，政治上的神經病尤其害不得。不幸，我們今天的若干大小官員們，却正害着很嚴重的政治神經病。這一害，實在是害盡天下，害盡蒼生。

政治上的神經病種類也頗不少，最常見的乃是比較輕微的神經錯亂症。但這還只是增加官場中的笑料而已，最多也不過是誤人誤事於一地一時，爲害尚不很大。最可怕的，則是政治上的神經麻木症和神經過敏症：其病象既不明白，判定也不容易，很難發覺，更難消除。而且它的感染性極強，在官場中傳播起來，既迅速且烈；弄到現在，滔滔天下，幾乎是莫不神經起來。

我們常常說的「尸位素餐」之類的考語，便是政治上神經病的脈案。

敷衍因循、苟且偷安、潦草塞責，以及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一類的作風，都是它的病象。萬般不動、百廢未興、一事無成，却不妨美其名曰「無爲而治」，或是譽之爲「政簡刑輕」。他們的全副行政本領，都只是表現在公文的技术巧上。而辦公事的密訣，則是盡在公文中打圈子，說來說去，總不外乎紙上文章，而且還極盡其空洞的能事。進一步，則更求能在公文上卸責，而大弄其「上頂、平推、下塞」的玄虛。凡屬一事發生

五。

把從人民那兒取來的錢，用一大部份在教養上面，乃是近代化的地方政府所做的事。這樣的政府，才是爲民衆所歡迎，所擁護的。我們以後應當時刻的注意到各級地方政府的預算，看他們在教養二方面支出的百分數，以此項百分數的高低，來判斷這種政府，是否應得人民的支持，抑爲人民所唾棄。

五月十一日，于清華園。

先不論其該不該做，也不去想如何樣做，更不管它做了怎樣，只求能把一切的責任加在別人的身上，卸卻自己的干係。於是想盡方法向上級去頂，把責任打回去；用盡方法向同級去推，把責任送出去；設盡方法向下級去塞，把責任丟開去。自己既然是無責可負，則不獨無事可做，落得清閒；同時又會無過可加，更其優遊自在。實在是頂不回、推不出、塞不開的話，則還有一套最後手段，「一拖」、「一錯」、「一攔」，於是不了了自了，萬事全休。這格言是：「無事不找事，有事不做事」。用聖人的話來說，乃是「明哲保身」之道。如此睜隻眼、閉隻眼的裝聾作啞，便是爲千古所豔稱的「難得糊塗」，而視爲可以流傳的「佳話」。

自來辦公事的老手，便是辦公文的內行，而以「不操心」爲原則。官員們既是只求能在辦公廳裏面去「享清福」，更不妨自詡高明的實行「官隱」。如此，天下事又焉能有爲？

任何一個青年初入仕途，不明官場氣習，大致都是抱着一腔熱血，預備大顯身手，爲國爲民做一番事業的。甚至今天一個條陳，明天一個建議，計畫不厭其周詳，方案不嫌其繁密；雖非純在表現自己的才華抱負，却也帶有匡世濟民的宏願。不幸他的素志還未展開，就已經引起了同事們的